

4

董大中
文集

鲁迅与高长虹

山西省作家协会 ○ 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非外借

董大中 文集

鲁迅与高长虹

山西省作家协会◎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大中文集·第4卷, 鲁迅与高长虹 / 董大中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066-7

I. ①董… II. ①董…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③高长虹
(1898-1949)-人物研究 IV. ①C53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0475 号

书名: 董大中文集·第4卷·鲁迅与高长虹
著者: 董大中

出版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赵勤
助理编辑: 牛晓红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总字数: 3190 千字

总印张: 207.75

版次: 2017 年 3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66-7

总定价: 498.00 元 (全 10 卷)

《董大中文集》编委会

主任：张明旺 杜学文

成员：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项目负责人：杨占平







2013年10月拍《一个人就是一个研究所》专题片时在高长虹故居,右边的屋子为高长虹结婚时所居



2001年与老伴在作协院内(曹平安摄)



1999年11月跟香港学者黄继持、学者和散文家卢玮銮(小思)在一起

董大中 著

鲁迅 与高长虹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开头的话	001
第一章 战士与主将的相会	005
第一节 冬夜拜访	005
第二节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体	011
第二章 《莽原》八个月	023
第一节 “五人吃酒”	024
第二节 先后来到、轻重有别的两个作家群	028
第三节 在日常接触中	039
第四节 《心的探险》：作者和编者	056
第三章 从“《斧背》风波”到“退稿事件”	062
第一节 “《斧背》风波”	062

第二节	鲁迅，依然关怀着狂飙社作家群	073
第三节	缘何“退稿”	078
第四节	两封公开信	093
第五节	失败者的狂叫	104
第四章	捕风捉影的“许广平之争”	116
第一节	问题的由来	117
第二节	高、许交往	121
第三节	高长虹的“单相思”	127
第四节	“月亮诗”不是“攻击”之作	142
第五节	“流言”种种	161
第六节	《奔月》以后	175
第五章	高、鲁冲突的文化反思	186
第一节	把历史还给历史	186
第二节	“一分为二”看高长虹	199
第三节	实事求是地开展现代文学研究	213
第四节	学会“争鸣” ——高、鲁冲突的历史教训	224
附录		
	《鲁迅日记》摘抄	229
	高长虹、鲁迅论争大事记	249
	论争文摘	267

开头的话

我是否走到了一段危险的地带？我的脚下是否埋着一颗地雷？

亲朋好友早就在提醒我注意，不要犯了“政治错误”；两年前，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谈高鲁冲突的，只说高长虹“有一点道理”，马上有朋友撰文，劝告我“矫枉”不可“过正”。这都出于一片真情，是应该感谢的。但是在我看来，在问题搞清以前，无论谈“过”还是“不及”，都不是时候，因为“枉”在哪里，“过”在何方，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因此，这些话没有使我退缩，反而促使我下决心到“雷区”走一走。

我有我的道理。

狂人有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鲁迅借狂人的嘴说出来的，它的内涵够丰富了，意义太伟大了。鲁迅就是向“从来如此”挑战的一位大无畏的“旗手和闯将”。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他基于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始于怀疑，而终于成了一位“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可以说，没有“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怀疑精神，也就不会有鲁迅，也就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类社会正是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不断怀疑和跟它相对应的另一面不断创造中，向前发展、向前迈进的。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摆在我面前的课题，真是小得不能再小，“微观”得不能再“微观”，但它同样有一个“从来如此，便对么”的问题。“老汉今年六十三”（这是借用来的一句话，我很怀念和尊敬说这话的那个

人，现在引用，乃是纪念)。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从老师的口中听到了“高长虹是反对鲁迅的坏人”这句话。两年前，也是由我那篇文章引起，一位比我小三几十岁的青年批评家，说高长虹已是“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前后几十年，前后几代人，都这么说，还不是“从来如此”么？但它就“对”么？说起来，我这个怀疑，还是从鲁迅的话来的。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序言中，用较之其他社团大得多的篇幅，评述了高长虹和他的狂飙社，说高长虹帮助他编《莽原》“奔走最力”，说高长虹所写狂飙《宣言》“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见本书附录。以下，凡引用附录中的话，未交代篇名者，只注篇名；交代了篇名者，不再加注）。并不了解内情的人的评价，跟“冲突”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评价，相差如此之大，能不令人生疑吗？

还有另一位哲人的名言：“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是掌舵者的切身体验，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导”。除了那些证据确凿的杀人犯、汉奸等等以外，在我们人民内部，在我们朋友、同事之间，当在一种倾向向下形成某种认识、某种结论，却还没有用事实加以验证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的错误。“反右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反右”之前，大家都是左派、好同志，运动一来，便每个单位都抓右派，没有右派，也要“选”一个出来，于是造成了一支几百万人的右派大军。“反右”是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把无数的好人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了。要不是七十年代末的大纠正，那些无辜被打成右派的人将永无出头之日，连申辩也不可能。高长虹被打成“反对鲁迅的坏人”，是不是跟这种情况相同呢？我看是相同的。不错，高长虹写过许多文章攻击、谩骂、诅咒鲁迅，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原因逼使他那样做呢？他是为了出名吗？他是想把鲁迅“打倒”吗？事实是明摆着的，原因却必须进行分析、梳理。不进行梳理，不搞调查研究，就把在某种倾向下所形成的那种认识、那种结论，接受下来，再加上自己随心所欲的发挥、阐释，这不就成了《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么？

还有，不说了，有的已经说过，有的还将说到。总之，这个“雷区”我是闯定了，并且毫不后悔。

一位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公案，都需要认真核查，逐个廓清。”这话说得好，正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鲁冲突甚且是一件很大的公案，其结果当然不像胡风集团案那样惨烈，但从发生的时间顺序说，它却是第一起大公案。我现在就要给这个现代文坛第一大公案提供一个说法。

其实，为这个公案提供说法，在我，是早就开始了的。一九八三年写“勿以偏概全”的杂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高鲁冲突，但在我内心深处，是认为高长虹在这件事上可能有很大的冤屈。后来，在《高长虹文集》出版以后的一九九〇年春天，写那本《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诗集〈给——〉鉴赏》的小册子，主要的甚至可说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高鲁冲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广平之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考察的结果，不仅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使我已经初步形成的对高鲁冲突的实质的认识有了自信。那以后，我陆续写了《论“月亮诗”》《高长虹的“单相思”》《这月亮不是那月亮》等文章，去年，又为《鲁迅与山西》写了《高长虹等人跟鲁迅的冲突》一节。工作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但还有许多材料没有放进去，于是只得再写这一本。

尽管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我却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我的一得之见。现在我需要的，不是求证，而是反驳。我衷心欢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我诘难，展开辩论。真理愈辩愈明。敢于发难的同志，是真正的好朋友。一位诤友，比起观点相同的朋友，具有同样的价值，甚至更大的价值，因为他可以使我们深思，把真理向前推进一步。

好，让我们在这“雷区”里大胆地走吧！

第一章

战士与主将的相会

第一节 冬夜拜访

一九二四年冬天一个刮大风的晚上，二十六岁的高长虹拜访了四十三岁的鲁迅。高长虹是这年初秋来到北京的。夏天，在太原，高长虹约集高沐鸿、籍雨农、荫雨、段复生和二弟高歌等人，成立“平民艺术团”（平，有时写作“贫”），创办《狂飙》月刊，正式打出“狂飙”的旗帜。《狂飙》月刊于九月一日问世，共出三期两本。第一期出版后，高长虹即赴北京，第二、三期合刊是由高沐鸿编辑的。高长虹到北京后，想出国，找到孙伏园，孙答应给予资助。后因鲁迅《我的失恋》被《晨报》总编辑撤掉，导致孙伏园辞职，而未能实现。高长虹又找到他父亲的同年、山西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报人景梅九，一方面为景氏所办《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做点校对工作，一方面另办一《狂飙》周刊，随《国风日报》发行。《狂飙》周刊的第一期是十一月九日出版的，至年底以前没有脱期。

高长虹这样叙述他赴鲁迅寓所拜访的动因：

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为出国问题，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

十一二月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据他看是好的。”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行得去也。^①

后来，在抗战期间的一九四〇年，高长虹写了《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的长文，对他见鲁迅之前对鲁迅的认识，是这样说的：

怎么样认识起来的呢？原因是我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同几个狂飙朋友在北平创办了《狂飙》周刊，获得鲁迅的同情反应。在这以前，我有些朋友在一个世界语学校里做了鲁迅的学生，我时常听到他们谈说鲁迅。《呐喊》恰好也在这年出版，这也是给鲁迅传说增加兴味的原因，不过我看了《呐喊》，认为是很消极的作品，精神上得不到很多鼓励。朋友们关于他的传说，给我的印象也不很好。他们都喜欢传述鲁迅讲书时说的笑话。比如，这个说了，鲁迅今天说：“中国人没有孙悟空主义，都是猪八戒主义，我也是猪八戒主义。”这已经不很好听，可是另一个还曾说，鲁迅说了：“人人都以为梅兰芳好看，这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梅兰芳也没有什么。”诸如此类。这种传说，给看《呐喊》的人所增加的印象，当然不会是很积极的。可是，说也奇怪，《狂飙》周刊在北平出版了还不到几期，居然在北平的文艺界取得它的地位，而最予以重视的，郁达夫之外，尤其是望重一时的大小说家鲁迅。我同鲁迅见面的机会来了。……

在标志着高鲁冲突爆发的两封公开信之一的《给鲁迅先生》里，高长虹

^①《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按，此文在《狂飙》发表时，题为《1925……》，收入《走到出版界》，改为《1926……》，当以前者为是。载《高长虹文集》中卷。

追述道：“回忆当时情况，‘普天下’能赏识《狂飙》者，只有你，郁达夫先生，日本友人伊东干夫，与开封的欲擒而已。”

这是高长虹真实心情的写照。能得到“望重一时的大小说家鲁迅”的“赏识”，对一个初次闯入文坛的青年来说，会使他多么高兴，会引起怎样的激动，可想而知。鲁迅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拜访鲁迅了。

关于高长虹来访，《鲁迅日记》有载，在十二月十日。《日记》载：“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世界语周刊》也是高长虹参加编辑的一份刊物。高长虹转述孙伏园的话，说鲁迅说《狂飙》“是好的”，是在一次“请客”时，“人很多，有麟也在”。查《鲁迅日记》，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这天是星期日），鲁迅“上午得三弟信，廿二日发。往真光观电影。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同一个月里，鲁迅设宴仅这一次，这次孙伏园、荆有麟都在。《狂飙》周刊已经出了三期，鲁迅必然会看到。下一次赴宴是在十二月八日，即高长虹来访前两天，人倒很多，却没有孙伏园和荆有麟。因此只能是十一月三十日这一次。这说明，孙伏园所述属实，高长虹所记亦是真实的。这次主客共五人，高长虹转述孙伏园的话，说“在座人很多”，当是比较而言，高长虹没有亲见，这样写不算失实。至于高长虹说到的郁达夫，在被删去的引文中还有具体叙述，不赘。

高长虹接着写到他跟鲁迅见面的情景：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我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①

《鲁迅日记》说是“夜风”，高长虹说是“一个大风的晚上”。高长虹撰此文时，《日记》尚未出版。两人说法相同，可见高长虹所记不误。

^①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文集》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